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八十六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忆李公朴	方仲伯(1)
一代英豪——邓演达	罗伯先(40)
忆陕北四老	秋松亭(49)
卢汉任云南省主席的经过	范承枢(56)
昆明起义经过	马 铤(81)
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	邓葆光(101)
伪满宫廷见闻琐记	孙喆姓(133)

忆李公朴

方仲伯*

一、苦难的童年

李公朴号仆如，原名永祥，号晋祥，江苏常州人，一九〇二年生，父李学增（号增培，又名善生），公朴排行第四。前母所生之长兄永仁（号晋仁，又名楠兴）早逝。次兄永义（号晋义，又名翰分）曾行医于淮安，也早逝。因其父曾在镇江沈家公馆做过佣人，故得沈家介绍，其同母所生之三兄公愚（原名永康，号晋康，又名寿同，比公朴年长十七岁），入镇江“合兴盛”五洋商店（京广洋货店）做学徒，期满后当店员。公朴十岁左右，曾读私塾，以学习勤奋而深得好评。然家贫，无以为生，不得不弃学就商。十三岁即随其三兄在商店做学徒。前二年，每月得“月规钱”二角，后一年半，每月得一块，三年半满师。他虽工作繁重，生活艰苦，但仍勤学苦读。他结识了一些青年学生，并常与之议论国家大事。对鸦片战争、甲午之役、戊戌变法、武昌起义等历史故事，尤感兴趣。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，打下了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“国之不存，何以为家”的深刻思想。

在震动全国的“五四”运动中，他发起组织爱国团，抵制日货。并以“长啸”为笔名，写文在报上揭露一些奸商与官府勾

* 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从一九三七年开始至李公朴被暗杀前，一直担任李公朴先生的秘书。

结，深夜将日货商标换成国货商标，使这些奸商受到应得的惩处。当然，“合兴盛”是他攻击的主要对象，于是他被这家店主开除了。

这是他第一次的爱国行动，但也是他第一次因爱国行动所受到的打击。

他并不气馁，相反的，更加奋发向上。这时，三兄公愚也因他被开除的关系，转到另一国货商店继续做店员，咬紧牙关，想尽一切办法，支持公朴继续读书。他说：“我们家境贫乏，但在知识上我们不能再贫乏了。”公朴读书非常刻苦，润洲中学毕业后，又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。在高中只读了一年半，因该校的校医虐待学生，酿成学潮，被开除百余人，他因是学生代表，也被开除了。

环境把他锻炼得更坚强了。从附中开除后，他又转到沪江大学附中上学，并兼图书馆工作。毕业后继续升入沪江大学，仍兼图书馆工作。一九二五年刚读完一年级，由于国内革命高潮的到来，经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介绍，他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。“五卅”运动时，他担任上海学联工人科科长，做联络工作。学生罢课游行，他在小西门一带散发传单，险遭逮捕，幸一个小商店把他掩护过去了。

二、参加北伐军

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，他又毅然抛开书本，弃文就武。他说：“班超能够‘投笔从戎’，难道我的觉悟还不如班超吗？”于是由上海到广东，参加了北伐军，被派到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工作。“打倒列强，除军阀，国民革命成功！”公朴一直唱着这首革命歌曲，从广东随着北伐军来到上海。他还天真地认为北伐军所向披靡，只要在上海稍事休整后，即可继续北上。统一全国，指日可待。

“四·一二”的枪声，击破了他美妙的幻想。突然在一阵血雨腥风中，共产党惨遭屠戮。曾是北伐战争主力的广大工人和共产党人的鲜血，成了新军阀、流氓黑帮、国民党右派升官发财的资本和向帝国主义屈服投降的晋见礼！

公朴亲眼看到广大革命人民倒在血泊中！他说：“‘国民革命’失败了，北伐变成了自戕。”他有一些同乡同学，乃至最亲密的战友，也被抓被杀。起先他还想方设法去营救，想不到灾难也临到自己头上了。一天，一个政治部的通讯员，拿了一包共产党的宣传品来，暗中告诉他说：“这是上司让我拿来藏在你的床下的，准备搜查、陷害你。”李公朴知道自己的身边有了豺狼，于是愤然离开了部队。

三、飘洋过海到异国

公朴脱离部队，想办一个“环球通讯社”。但当时蒋介石搞的新闻检查，钳制言论自由比袁世凯、孙传芳更为厉害，不仅不许你刊登什么，而且要强迫你必须刊登什么，否则就不让发行，或强行封闭。这样，通讯社还能起什么作用呢？公朴放弃了这个设想。

这时，美国阿雷干州黎德大学为了培训青年会的工作人员，给中国学生设有奖学金，入学条件是：英语基础好，大学未毕业，并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，是基督教徒。公朴恰恰合乎这些条件，经青年会推荐，考试后被录取。于是他毅然摆脱一切，出国留学。

公朴在北伐时组织慰劳会，认识了张曼筠女士，她是上海有名书画家张筱楼（以画梅花著名）的次女，北师大高材生。他们原约定于南北统一之后结婚，而北伐既已中途而废，公朴又将去美国留学，遂于一九二八年初结婚。婚后几个月，公朴就出国了。

出国时，途经日本神户、大阪、西京、横滨、东京等大城市，并登陆游览各地名胜。他曾写信给韬备说：“北伐中道而阻，帝国主义从而利用之，内战频仍，外患日巨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任人宰割瓜分，究将何以立国？今看彼邦一片升平景象，建设工作之成绩，人民安居乐业之状况，令我回想祖国，不禁感触万端。离日本后，即直渡太平洋，在船上十余日，风平浪静，加之船上设备精适，饮食丰盛，这种舒服生活，吾辈苦学生当之，诚有局促不安之寒酸相也。抵西雅图时，该处青年会总干事富勒夫妇来接，翌晨又送上车站，赴抱特作城，六小时即达，黎德大学学生会会长卡尔君已奉校长命在车站等候矣。此城风景秀丽，为阿立康省最大之一城。居民不多，街道民房均极宽畅。学校范围虽不大，但校誉极佳。其学规之严，功课之认真，地位之适宜，设备之完全，乃美国小的大学中最享盛名者之一。到此后，学生教授待我均甚好，校长夫妇则尤照顾周到。卡尔君与我同室，房间两小一大，小者为卧室，大者为读书室。卡尔君为此校品学兼优之学生领袖，我当受益不少。所读功课为政治系，计有法文、美国之政府、社会史、社会学、市政研究等，两年读完，再赴欧洲实地考察。我将利用余暇旁及乡村教育之研究。”最后，他还希望“海内教育家不吝赐教”。可见他当时即有志于社会教育。

公朴在美留学期间，曾为韬奋主办的《生活》写“海外通讯”数十篇，举凡政治、经济、生活、风习，应有尽有。而且均经实地考察，亲身体验，所以生动活泼，发人深思。

美国选举总统时，他不但收听竞选演说，并去选举场地观看投票，还访问各方面不同职业、不同观点的投票人。最后从现象到本质，具体分析其成败的关键，写了一篇《美国普通人民对选举总统之态度》的报道。其中也提到：“以美国人民之程度，其政治内容尚如此不完全，于此可见‘民治’之实现，良非容易之事也”。

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二年底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世界经济总危机。当时美国虽号称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，但多数人仍过着不足以养家活口的生活。当时他就写了《值得我们注意的顾虑》一文，说：“当时有五位曾在华盛顿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等担任过教授的政治学家，也似乎很替我们担心，不愿中国政治的发展前途，重蹈美国为资本家所把持的覆辙。我们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呢？‘平均地权，节制资本’能行得通吗？”

通过学习、考察、讨论以及节日交往，公朴写了不少关于中美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的细致入微的通讯。例如有人说中国人排外，他反驳说：“对那些侵略者，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，中国人民当然就恨了。这能说是排外吗？大量的美国人民都希望中国振作、强盛。他们一谈起来，就慷慨激昂，争论热烈，真是‘津津乐道’的。但对我国官方一些失败政策，无不愤恨填膺。”他在《双料皮毛》、《海外的官瘾》、《中山先生给谁气死了》、《中国参加比国博览之教训》等通讯中，深感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远远落后于日本，“美国还未独立时，中国已是清朝鼎盛之秋，而今相形之下，不胜沧桑之感。”

但他当时还只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抱有一定幻想。如一九二八年底“东北易帜”，他看了《全中国只有一种国旗了！》（这是当时美国报纸的大字标题）一文以后非常高兴，写了一篇通讯，认为中国南北统一了，除了担心日本的侵略外，很希望中国国民政府能够“积极从事建设事业，健全五院之组织，猛力发展经济及教育之普及，二十年后，不难与英

之为“工旅”。经欧洲时，在日内瓦还参加了各国人民促进国际和平团体联合大会。公朴感慨地说：用选票代替枪杆，应设法唤起全国人民注意，“阿斗能力虽薄弱，苟能不畏艰难，不躲避责任，一如热心促进国际和平者之所为，未必会无效果可期。”这是他早期要以人民力量反对内战，争取民主，促进国内和平的设想。他在这些方面，也写了不少通讯，寄给《生活》杂志。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八日回国时，韬奋曾在《生活》上发表了《记欢迎李公朴君回国》一文，说：“公朴君为异常爱护《生活》之一人。二年前赴美求学，本刊即以驻美特约通讯相托，承他于百忙中为《生活》执笔，异常勤奋，其通讯之见于本刊者夙为读者所传诵，不必记者重为介绍。”

四、目睹千疮百孔的祖国

公朴兴高采烈地回到祖国，抱着“唤起民众”的雄心壮志，积极筹备他出国前所要办的“环球通讯社”。同时与韬奋、戈公振、杜重远、毕云程等筹办《生活日报》，一切均已就绪，但终因反动政府百般刁难，以致未能出版。（以后韬奋曾在香港出版）

当他回国时，正是蒋介石集结数十万兵力对红军进行三次围剿而被粉碎的时候。不久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由于蒋介石执行不抵抗政策，日军侵占了东北全境。接着日本侵略者又发动对上海的新进攻，声言要几小时内占领上海。上海军民奋起抵抗，爆发了有名的“一·二八”抗战，但又被蒋介石破坏了，十九路军被迫撤退。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战的行为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。公朴认为，上海抗战是“中国人民未完成的杰作”，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。一九三二年一月，反动政府迁都洛阳之说甚嚣尘上，并传将以西安为陪都。于是反动政府的要人大谈“开发西北”之计。公朴当时以新闻记者身份，也步他们“相互奔临”的后尘，由潼关坐汽车到西安（当时陇海铁路仅到潼关），调查

西北的社会情况。以后在《生活》上发表了一篇《潼西道上》的报道。他说：“前年西北诸省之大旱灾，赤地数千里，饿死人数达二百万。其中以陕甘为尤甚。仅就陕西而论，灾民逾二百万，饿死者近百万，达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强。惨苦情形，不堪想象。至去年汉口等处水灾爆发，于是举世目光复由西北而转移中部。当我国民众正在水深火热惨祸之下，日人则乘危入犯，侵我东北，更进而称兵淞沪，于是劫后余生之千万灾黎，旧疮未复，又遭国难。于此哀鸿遍野之灾区，始因外患而见重于国人。此种临时抱佛脚之心理，对陕西现状不能有所改善也。”当时陕西鸦片为公卖品，这更使他“触目惊心”，在文中写道：“沿途罌花遍地，虽临潼之秀丽，贵妃之香池，坝桥之翠柳，亦相形失色。无论男女老幼，贫富贵贱，均相率吸烟，不死于饥饿，即死于烟毒，鸠形鹄面，逐处皆是。”他还谈到：“黄河连年泛滥，灾民遍豫鲁苏诸省，动辄近千万，这不比一般水灾，所以特称之为‘黄灾’。现在鸦片，不仅西北如此，西南也大都如此。政府收入虽多，无如人民赤贫如洗何！早知今日公卖，又何必有鸦片战争之举。这就应该特称之为‘黑灾’了。”

紧接“一·二八”之后，热河又告急，华北已处于风声鹤唳之中。当时仅从粤、鲁、川之战乱来说，荼毒人民，惨不忍睹。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成立“废止内战大同盟”，公朴出席报告国际和平协会情形，并说明外人不明中国内战之所由起。他这时已明确认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行为，不禁气愤地说：“蒋介石不配作中山先生的继承人。”祖国的前途、民族的命运如何，他需重新探索。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，他在《申报》创刊六十周年纪念的时候，创办了《申报》流通图书馆。一九三三年二月又创办了《申报》业余补习学校，六月又添办《申报》业余妇女补习学校。八月以后，为了满足职业青年的要求，增设业余补习学校的分校，分布上海市区的几个地点。并在图书馆创设“读书指导部”，

在《申报》开辟《读书问答栏》、《店员通信》、《业余周刊》等专刊。当时柳湜、艾思奇、夏征农、廖庶谦等都是这些专刊的负责人。原来的“鸳鸯蝴蝶派”副刊《自由谈》，改以连续刊登鲁迅杂文的新面貌出现，也是出于公朴的建议。以后他又主编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，并发展为“读书生活出版社”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，《申报》负责人史量才继杨杏佛之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暗杀。当时公朴正因练习骑马，摔地受伤，住在医院里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他极为气愤。商请走出医院，骨折的手臂挂着托板，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礼堂举行的史量才先生追悼会上，他作了痛斥国民党特务丑恶行为的演说。《申报》因史量才遭暗杀而被迫转向，于是《读书问答栏》等专刊改由《读书生活》半月刊发表。图书馆、业余补习学校，均将“申报”二字，改为“量才”，以示纪念，并从政治上、经济上、组织上完全脱离《申报》，以免受《申报》转向的影响。这是他同柳湜、艾思奇、夏征农等同志研究之后所决定的。以后图书馆继续发展，图书由两千多册增至三万多册，读者由二三百人增至二万多人。补习学校由一校增至八校，学生由二三百人增至四千五六百人。这些学生以后大都成为职业界救国会的骨干。当时《读书生活》的影响也至为深远。由“读书生活出版社”出版的许多《问答》、《讲话》、《常识》等等都是传播马列主义普及社会科学的重要读物。如艾思奇的《哲学讲话》（后改《大众哲学》），柳湜的《街头讲话》，高士其的《科学小品》，夏征农的《文学讲话》、《读书问答集》，曹伯韩的《算学讲话》、《民主讲话》等。以后还出版了许多通俗读物，如《社会常识读本》，包括有曹伯韩的《帝国主义》、《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》，楚云的《妇女问答》，庶谦的《读书常识》、《读报常识》等等。他主张把图书馆办得“学校化”，把杂志办得“讲义化”，主要是着眼于工人、职员、小店员、失学失业青年。目的是使他们懂得如何生活，如何学习，读书与社会实践的统一，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。他这时具体认识到我们国家要救亡图

存，必须唤醒民众，一致起来制止内战。这就是他所说的：“对内求团结，对外求抵抗。”他全力以赴地为“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”而大声疾呼。但他对内战之根源并不明白，只看到一些现象，没有抓住本质，以致某些时候，往往采取“和事佬”的态度。

五、沉默后的怒吼

一九三三年十月，蒋介石集结一百万军队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攻，并以五十万兵力直接侵犯中央苏区。为配合前方的“军事围剿”，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“文化围剿”，对革命文化运动施行前所未有的压迫。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成了一面旗帜，公朴对他是极为尊敬的。当时《生活》和《读书生活》在反文化围剿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它们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，响应党的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及发动群众方面，做了大量工作。公朴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坚决信任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。有的党员直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告，而公朴则在暗中掩护他们，一直信任他们，毫不动摇，如对夏征农就是一例。由此可见，血的事实教育了公朴，他开始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走向人民群众，走向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，他已逐步成为共产党的同伴和战友了。

“九一八”四周年时，他在《读书生活》发表了《一天的日记》。他说：“现在是第四个‘九一八’，一周年是愤，二周年是恨，三周年是忍，第四周年呢？《新闻报》的副刊：《忍的第四周年》。还是忍。一直忍下去吗？感慨已发表很多了，现在还有何话可说！某名学者主张到‘堪察加’去。今天电台停止播送娱乐节目，上海南京只准人见面行一个礼，机关团体则表示‘埋头苦干’。当然，北平是不准集会的。然而满洲国新京纪念的盛曲正宣传得‘一片欢腾’啊！”

“九一八”、“一·二八”的创伤，似乎已被人遗忘了。当时徐

道邻提出《敌乎？友乎？》的问题，于是引起了朝野人士一番议论。有人说：“不能为敌，不配作友”，“必定要有作敌人的资格，然后才有可能作朋友”，“中庸和平之道，委屈求全之望，终不可得”。公朴很愤慨地说：“一个国家，不能依靠别国的恩赐而存在。现在我们失去的土地究竟有多少？七个四川，十二个广东，十三个湖南，十四个陕西，十五个湖北，十六个河南，十七个山西，十八个山东，十九个安徽，二十三个福建，二十七个江苏，二十八个浙江。四个法国，五个德国，六个日本，十个英国，六十个瑞士，七十个荷兰，八十个比利时。我们国家虽大，能够这样‘睦邻善处’吗？现在冀察政委会，也必须聘请×籍顾问（按：原文如此。顾问系指日寇。这是为了对付当时的上海“租界”当局和国民党反动派，他们不许直接指斥日本侵略军），是‘顾问’呢？还是主子！天知道。”他高呼：“春寒总是要消逝的，准备你们的嗓子，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吧！”

在民族存亡的时刻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“一二·九”、“一二·一六”爱国运动震动了全国，各地爱国救亡组织纷纷成立。上海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。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（包括职业界、妇女界、学生、大学教授等救国会，以及国难教育社等单位）。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。全中国人民怒吼了！

公朴这时热血沸腾。他首先参加文化界救国会，以后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、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，他都被选为执行委员。关于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《大公报》说是“学潮”。公朴在《读书生活》发表了《是学潮吗？呸！》的短评说：“我们的血也在沸腾了，请政府不得压制爱国运动。现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成立了救国会，大学、中学、职业界、工商界、……农村中的乡民，也纷纷要求参加救国会，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其可抑制得了吗？”

他还说：“现在只有两条路：一条是准备当亡国奴；一条是不愿当亡国奴。前者是我们的敌人，后者是我们的朋友。对朋友可以放弃不同成见，旧账一笔勾销；对敌人绝不容忍，也不怕受任何暗算和谋害。”

当时北平中法大学曾将该校学生会给公安局的一个收据，公诸于世：“今收到：爱国囚犯十二名，在军警严密保护之下已从高碑店安然抵校。此致公安局西郊区署。中法大学学生会。”公朴发表短评表示抗议，他说：“我们对全国因爱国而被拘捕伤害的战士表示敬意！并对爱国治罪的野蛮行为提出严重的抗议！抗议！！抗议！！！”

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，在为鲁迅先生送葬的大游行中，公朴站在队伍的最前头。

六、七君子之狱

抗日救亡运动风靡全国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，又加上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大罢工，国民党反动政府吓破了胆，于是把黑手伸向上海的救亡运动。

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二时，公朴同沈钧儒、邹韬奋、史良、沙千里、章乃器、王造时等七人，同时被捕，并辗转解押于上海市公安局。

这件惊人的消息，在报上刚一发表，社会舆论大哗。反动政府知道民情愤激，乃由上海市长吴铁城出面，胡乱向报界发表所谓声明：“李公朴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，托名救国，肆意造谣，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政府之信仰。近且勾结‘赤匪’，妄倡人民阵线，煽动阶级斗争。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，改组国防政府。竟复由言论而见诸行动，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，以遂其扰乱治安，颠覆政府之企图。”等等，捏造了一大堆所谓罪名。军警便衣，日夜轮流看守，戒备森严，绝对不准见

客。但纸是包不住火的，全国一片呼吁、抗议和声援声，告书、宣言、函电、交互纷驰，乃至集会游行、请愿、示威。英、美各国的国际知名人士，以及海外侨胞，各地名流学者，也联名致电，表示关切同情和要求立予释放李公朴等。“救国七君子之狱”，震惊中外。十二月四日，李公朴等六人由上海市公安局解往苏州高等法院，羁押于看守所。史良则于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时亦被解往苏州，另羁押于司前街女看守所。自被捕到正式提起公诉，亘五个月之久。翌年二月三日，还由苏州高等法院裁定延长羁押两月。检察官挖空心思，绞尽脑汁，极尽捏造罪名之能事，才以所谓“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，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”之罪提起公诉。但起诉书经被告及辩护人义正辞严逐条加以批驳，指出“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，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，实属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摧残法律之尊严，妄断历史之功罪”。再经在法庭上舌枪唇剑，短兵相接，“七君子”和二十五位名律师，直把这些检察官、审判长弄得丑态百出，狼狈不堪，一个个低头搔手，张口结舌，无辞以对。特别是沈钧儒先生，就像当年在法学院课堂讲法理一样，慢言细语，层层追问，毫不放松。法庭完全成为被审判者审讯审判者的审判台了。被捕者严正地宣称：我们所争的是“救国无罪”，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的自由。当时公朴在看守所就正式签题：“拼七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。”

公朴在狱中，始终是精神饱满的。当全付武装军警押送他们去苏州时，车至中途，沈老推他向“武装同志”们致谢辞。当他讲到国难的严重和他们团结御侮的主张时，非常激动，声泪俱下。“武装同志”们深为感动，有的眼眶里还涌上了热泪。讲完了又带领大家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悲壮的歌声，激发着大家爱国热情，他的双手是那样有力，他的声音是那样响亮，全体“武装同志”也一致随声和唱……

他们“六个人是一家人”（因如前述，“七君子”中的“女君

子”史良另住一处)，住在一个高墙的大院里。沈老是他们的“家长”，其他五个“难兄难弟”，分管会计、文书、事务、卫生、监察。大家称公朴是“事务部主任”，事无巨细，从管理“慰问品”直到手纸的分配，他都承担下来。他们工作、运动，悉有定时。每天早晨做体操、跑步或打太极拳。白天看书、练字、翻译、写作，没有一个人闲着。沈老同大家约定：“六个人是一个人”，有罪大家有罪，无罪大家无罪；羁押大家羁押，释放大家释放。对一场艰苦的长期斗争，他们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。

“七君子”被捕羁押八个多月，正式开庭审理只有两次。第一次是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。第二次是六月二十五日。当时公朴还年轻，但颌髯长半尺，衣长衫，恂恂然有长者风。他每次答辩，都是从容地捋着美髯，据理力争，非常坚决。如问到“救国会的宣言纲领和宗旨”时，他答说：“四个大字，抗日救国。”当提出所谓“联合各党各派就是容共”的问题时，他答说：“联合各党各派，是‘九一八’以后，国难会议以来，上下的共同主张。内容是化除成见，共同抗日。检察长大惊小怪，竟扯到容共上去了。各党各派，当然是而且首先是国民党。为什么不提国民党，只说共产党。如果说这就是容共，中山先生也主张容共，难道是中山先生错了吗？”对所谓“共产党主张抗日、建立国防政府，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上也主张抗日，建立抗日政权，这是被共产党利用”的问题，他答说：“我很奇怪，现在竟有人以为共产党说的话，别人就不能说了。共产党说抗日，难道我们就只能说不抗日吗？共产党说统一，我们就只能说不统一吗？（在这个问题上，沈老更直截了当地说：难道共产党吃饭，我们就不吃饭了吗？）我国四万万人都要求抗日，只有汉奸除外。我相信审判长也是要求抗日的，如说这是被共产党利用，那审判长也是被共产党利用了。不管是谁，只要他坚决抗日，我就心甘情愿地被利用。”他还特别反诘说：“如说救国是‘危害民国’，难道卖国

才是‘保卫民国’吗？如说呼吁救亡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，难道与三民主义相容之主义，是当亡国奴吗？”

这些所谓“法官”们虽然机关算尽，总想把“救国”说成“有罪”，还想摆一摆“法官”架子，借以吓人；不料碰着“七君子”及二十五位名律师（当时全国还有许多名律师都要求为“七君子”作义务辩护人）毫不让步，使他们无隙可乘。第一次审理还未终结，因审判长拒绝调查证据，致使全体律师一致“罢席”，被告一致拒绝答辩。旋即审理中断。到第二次审理时，仍紧张万分，无法终结。有的反诘他们的讯问是“牛头不对马嘴”；有的直接反驳其“缺乏地理常识”；检察官说他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，接着就有人提出：“希望代表的是中华民国，否则，老百姓太丢脸了。”检察官气急败坏地说：“这是侮辱检察官，妨碍行使职权”，要求书记官记入笔录。大家说：“这是阻止被告合理申辩，侮辱救国会”，也要求书记官记入笔录。弄得他们哑口无言。“西安事变”发生后，反动政府慌了手脚，于是又以此来嫁祸于“七君子”，认为他们去年曾给张学良打过快邮代电，这是一种“勾结”的“轨外行动”。沈老反驳说：“如认为这是‘勾结’，我们也同样打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、宋哲元、韩复榘等军事将领，那不是也同国民政府‘勾结’了吗？既然‘勾结’，有‘勾结’一方，当然还有‘被勾结’一方。”沈老郑重提出：“必须传张学良到法庭对证。”弄得那些“法官”们满头大汗。旁听席上的人，也不顾法庭的尊严，哄堂大笑，拍手叫好。站立两旁的法警竟也相视而笑。

硬的一套不行，他们又来软的一套。叶楚傖、杜月笙、钱新之等秉承蒋介石旨意，出面“从中斡旋”，只要七人能写一悔过书，即可“到南京任事！”“赴庐山聆训！”“给钱放洋出国！”七人的共同答复是：没有“过”，用不着“悔”。公朴当时坚决表示：“决不丧失立场和人格，有违初衷。”

为了声援七君子的斗争，首先是宋庆龄、何香凝、胡愈之、

沈兹九、诸青来、张天翼、陈波儿等十六人在上海向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，随后，即带着行李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。于是“救国人狱”运动，遍于全国。中外电报声援，纷至沓来。

七人之狱未决，北方早已烽火蔽天，平津又相继告急，卢沟桥的枪声已震入耳际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，南京政府不得不同意释放“政治犯”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时二十分，“七君子”同时走出看守所的大门。看守所长朱同亲自送到门外。虽然他们出狱的消息，事前并未宣布，但看守所的门口已鹤立群众近千人，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。军乐声、爆竹声、欢呼声，震动大地。大家列队出金门，经大马路，而后至花园饭店，沿途人山人海，无不鼓掌欢迎。晚上七时许，由李根源、张一麟等多人在国货公司屋顶花园公宴沈等。七人一致表示：“在狱中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，没有做过一件损人格的事，没有写过什么悔过书，为救国人狱，为救国出狱，决不变更原来宗旨，全国一致抗日救国。”当晚十一点半即回到上海，乃有比较接近的亲友百余人在北站月台上等候。大家都非常兴奋，甚至尚卧病榻的何香凝女士，也从床上支撑起来喊着：“啊！他们回来了。”立即派胡兰畦代表她到车站迎接。十二时半，各团体代表和救国会负责人胡兰畦（代表何香凝）、胡愈之、钱俊瑞、彭文应、张志让、沈兹九、谢承平、罗叔章、梅龚彬等在邓脱摩饭店为七人设宴洗尘。这时忽然一百多个青年学生代表闻讯赶来欢迎“七君子”，并要他们讲话。沈老等讲了话，公朴当时也发了言：“被捕时手枪对着我们，我们认为最多不过是‘死’。但我们不怕死，因为我们相信死后会有成千成万的人继续起来的。我们要以死的决心争取中华民国的抗战胜利！”

八月二日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设午宴欢迎七人和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。

这天在上海南市还开了一个官民合作的大会，欢迎“救国会